

论“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困境

傅守祥¹, 郑露娜²

(1. 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乌鲁木齐 830046; 2.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作为政治讽喻小说,“反乌托邦三部曲”包含无数道“凝视的目光”,其中的女性是被镜像化、物化、符号化甚至去性别化的存在,其身份的残缺注定其话语的无力,既没有为女性“发声”的权力,也没有塑造个性形象的能力。细读这三部“走在时代前列”的小说,发现存在明显的思想死角,属于男性话语构造、以男性为主体的“重构未来”,女性主体性依然缺位;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同时遭遇身份困境与发声困境,女性在被“随意涂写”的窘迫中隐含着“她”性别消失以及爱、希望、想象力消亡等系列危机。在渐趋理性的时代,一种两性博弈相处又共情合作的公序良俗,需要求同存异、包容互补式的清明、自律与努力。

关键词:反乌托邦三部曲;女性形象;女性困境;性别平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4-0038-07

苏联作家叶甫盖尼·扎米亚金的《我们》、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三部写成于1921—1948年间的小说,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以下简称“三部曲”),以其故事性、警示性、寓言性而广受关注。遗憾的是,小说自诞生起,从女性角度切入的研究还不多。仔细研读这三部“走在时代前列”的现代小说,发现其中的女性形象往往遭遇扭曲式的描绘,镜像化、物化与去性别化依然是其最常见的描画方法,身份困境与发声困境依然是女性社会处境的真实写照。无怪乎有研究者指出,无论从文学作品中,还是从现实生活里,文学女性都懂得她们的命运“总是枯燥乏味的,总是受别人控制、被别人设计”^{[1]14}。

一、镜像化、物化与去性别化的女性形象

在以往的写作中,往往是男性拥有话语权,创造了关于女性的符号;女性只不过是谈论、被规定的客体对象,男性话语权操纵着整个语义系统。男性创造了关于女性的字、词,创造了女性的价值、形象和行为规范,因之也便创造了有关女性的

一切陈述^{[2]434-435}。“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均出自男性作家笔下,这些女性形象面临着男性作家的“不公正”刻画,在女性躯壳之下是一个个被剥离了真正的女性特质,被镜像化、物化与去性别化的“非人”形象。

在小说《我们》^[3]中,女性形象是被刻板化塑造的。小说主要讲述发生在透明世界“一体国”里编码D-503的男性公民与编码I-330、O-90的两位女性公民之间的故事,好公民与反抗者的爱情在真与假的恍惚、对与错的犹疑中展开,并因男性做了想象力切除手术而终结。这样两位对男主人公起到重要作用的女性形象,在小说中却只给人留下抽象的符号化记忆——这是因为男性作家对其笔下女性客体的面容“描摹”,经常“并不是根据她们实际上的样子,而是根据他们对她们的梦想”创造出来的^{[1]23}。《我们》中的O-90和I-330全然是从男性D-503的视角出发来描述的:O-90被视为“孩子”“天真”,对于她的几处外貌描写着力突出其柔弱、感性的方面,这无不让人联想到单纯(且空洞)的“天使”形象;小说中另一女性形象I-330则是“白森森的牙齿闪烁着光芒”,

收稿日期:2022-03-08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青年重点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机理与文化增殖研究”(2021QN010)

作者简介:傅守祥(1970—),男,山东东营人,文学博士,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露娜(1995—),女,浙江台州人,文学硕士,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头顶一个无法解开的 X 符号,无疑是与“天使”对立的“怪物”形象。“天使”与“怪物”这两类形象长久存在于男性作家的笔下:从但丁《神曲》中对圣女贝阿特里奇的描写,到弥尔顿笔下“我那圣洁的亡妻”、歌德《浮士德》中的“永恒女性”,“天使”形象被一代代男性权威之“笔”所固化^{[1]28}。男性渴望女性作为“天使”般的洁白来装点自己的生命空间,而与男性标准不符合的、天使的对立面则统统被纳入“怪物”的模型,当她们在某一层面上令男性感受到威胁,让男性感到难以掌控之时,男性就用他们的笔抹杀她们的形象。作家在刻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时并非将女性作为文学作品中的独立形象来进行特色描写,而是沿袭了历史上男性作家们塑造的“天使”与“怪物”这两类对立的刻板化女性镜像,这不可谓不是对女性形象描写的一种局限。

而在 1932 年出版的《美丽新世界》中,女性则是全然物化的。在这个被称为“世界国”的国家内,男性与女性可以随意上床而不受道德约束,“每个人属于每一个人”,交往成了公开、透明,或者说“赤裸裸”的事情,“性”如同非处方药一般被滥用。于是,在他笔下女性完全成为令人心惊的“肉体”,没有作为“人”的意志。该小说的女主人公莱妮娜是一个“脸上长着红斑,眼睛是紫色的,但是非常漂亮的女孩”^{[4]26}。她身材丰满,几乎曾与生育与培育中心的所有人共度一夜春宵。而世界国众人对莱妮娜的追逐仅仅是出于她的姣好面容。女主人公莱妮娜自己也大多满足于这样的现状:当听到野人约翰说爱她时,她的反应是更热切地准备做爱——一切最终都归结于做爱这个动作,除此之外,“爱”不代表任何东西。归根到底,莱妮娜的思想世界空空如也,她能感受到的只有自己的身体与身体性爱带来的快感。世界国所标榜的“工作时像成年人一样理智,然后像婴儿一样纵欲”^[5]使得女性在这样的机制下成为没有思想的“物体”,习惯了以自己的肉体作为自身的所有存在与依仗,心安理得地做性爱机器。

在 1949 年出版的《一九八四》中,女性的形象则是压抑的。小说中,人人都在大洋国最高掌权者“老大哥”的监视之下而没有私人空间,大一统王国为了将民众的狂热投掷于战争中而采取禁

欲主义。于是,所有女性都面临着自身身份的压抑与美的压抑。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认为性生活是不得已的,仅仅为了“生个孩子”“完成义务”而进行,不曾认识到这也是女性可以享受的权利;而温斯顿的同事裘莉亚则从来没有穿过裙子、丝袜、高跟鞋等女性化的着装。所有人对于美尤其是女性美都没有概念,甚至温斯顿一开始只能偷摸妓女来得到机械化的性快感。小说中的统治者极力消解个体的特殊性而使所有人都成为集体的无名的一分子。小说中的这一切反常现象和行为,受到了女性意识觉醒的裘莉亚的反抗。她不满于大洋国泯灭女性身份的行为,认为“总是生活在女人臭里!我真恨女人”^{[5]151}!这憎恨在于这些“女人”都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人,如同温斯顿的妻子一般只当自己是个“党员同志”,对性生活充满抗拒乃至恐惧,同时,她们作为党员同志从不化妆,只能穿规矩的制服,极力掩藏自身的性别特质。这样的压抑让性意识强烈的裘莉亚产生反抗心理。她首先唤醒自己的身体,通过性爱享受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体快感,紧接着在外貌形象上改变自己,通过化妆进一步突出自己的女性气质,将自己从“无性别”的党员同志身份下解放出来。正如裘莉亚所说:“在这间屋子里我要做一个女人。”从而喊出了她对自身“女性”身份的追求。但是,裘莉亚的觉醒一定程度上只浮于她的外表,她开掘了自己的容貌美、身体美,却无视其精神之美。她在这间“安全”的房屋内让自己成为一个“女人”,穿裙子、化妆、享受身体的快感,但在思想上并没有试图寻求解放;她不怎么喜欢读书,对党的权威加以回避,她的视野局限于自己当下的生活,局限于肉眼可见、肉身可感的性欢愉,但对精神的自由不曾提出渴望,如同温斯顿所说的“你只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5]181}。

由以上分析可见,“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都带有资本主义极权社会特定描写的烙印,三位男性作家笔下关于女性的描绘仍受到种种困境的局限:两性的性爱关系模糊,性与爱在作品中遭到分割;女性的身份残缺,往往只有单薄平面的形象;女性的话语权受限,既受制于文本中的男性主人公又受到男性作者的控制。

二、爱意残缺、话语残缺与身份残缺的女性困境

在“三部曲”中,作为人性本能的性爱受到资本主义极权政府不同程度的管控:《我们》中必须通过粉红票子完成性对象的分配,时间地点都受到严格限制;《美丽新世界》中“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人”,性交仅仅是行为而没有一对一的爱情关系,也不需要承担义务;在《一九八四》中推行禁欲主义,只提倡在夫妻间为了生育后代而性交。“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性与爱不产生必然的联系,两者完全割裂而使人失去“爱”的能力。统治者通过对性的管控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于是人们也通过性的结合来反叛资本主义极权,“性”同样成为一种政治反抗的手段。《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将自己与裘莉亚第一次在黄金乡的幽会看成是一件“政治行为”。不仅如此,《我们》中的O-90渴望通过性爱为D-503留下独一无二的后代,《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与裘莉亚逐渐在性交往中产生爱情。虽然“性”是政治反抗的工具,但爱的本能也使他们通过这一方式萌生了独特的“自我”,从“无我”的资本主义极权中觉醒过来。可惜的是,不论是《我们》《一九八四》中成为政治反抗工具的“性”,还是《美丽新世界》中单纯地为性而性,资本主义极权统治下被割裂的性与爱都无法产生正当、合理的联结;莱妮娜与野人约翰,一个只知道性而不认识爱,另一个则空洞地秉持将女性完全符号化的观赏与操纵之“爱”;裘莉亚的爱败给了温斯顿对老鼠本能的恐惧;O-90对D-503的爱仅仅止步于O-90单方面的表达,得不到尚未觉醒的D-503的回应。真正的爱在小说中没有萌芽成长的土壤,小说主人公们最终面临的也都是反叛的失败。“三部曲”描述女性时多集中刻画其“性”行为、性表现,而对女性从中感受到、表达出来的爱却缺乏表述,或因笔力不济,导致女性成为性/爱割裂的受害者,成为一具“无爱”的肉体。

小说中的女性面临的不仅是爱的匮乏,还有身份的单一。社会语境下的女性通常拥有诸如妻子、母亲、姐妹等多重身份,以对应女性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而多重身份、多种性格则共同构

成一个完整、立体的女性形象。但是,“三部曲”中的女性往往刻画单一,徒具轮廓。如同《我们》中的镜像女性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往往会陷入笼统刻画的窠臼,缺乏特色。更令人瞩目的现象是,“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往往与“母亲”的身份割裂。在“三部曲”中,“母亲”这一词汇的出现频率少之又少,“母亲”几乎被弃置、被牺牲。在《我们》中,性是一件“供应品”,以享乐为目的的性不再带有生殖的功用。O-90想要拥有一个D-503的孩子需要冒着被关进“恩主”机器的风险。彰显她母亲身份的日益变大的肚子使得她无法在文明社会继续生存,最后只能被I-330送往“绿墙”外,与所谓的原始人一道生活,才能有生下孩子的希望。当然,她的孩子可能也是这个“乌托邦”的希望,是新的“弥赛亚”将要诞生的昭示^[6]。

同样的生育境况也发生在《美丽新世界》中,而美丽新世界对于生育、做母亲的反对态度更为鲜明。小说展示了另类的现代受孕过程:精子、卵子、卵巢都被剥离人体,在容器中进行受孕。当女性身上最特殊的器官——作为生育之用的子宫有了替代品之后,“母亲”这个名头也就可有可无了。因此,在“世界国”里,母亲是一个较之父亲更为下流的词汇。由此在“世界国”出现了特殊的“雄化雌体”——被剥夺子宫这一器官的女性。同时,占大多数的生育期女性却受到节育带、节育操的规约。在作者的设置下,“世界国”唯一胎生的约翰只能在野人保留区内出生,身为“母亲”的琳达也无法对“母亲”身份产生认知或感同身受,并日渐衰老、丧失活力。这种所谓文明社会弃置了母亲身份,使得女性的性别身份愈发单薄。

与《美丽新世界》相反,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母亲”这一词汇被保留下来,资本主义极权政府只推崇以生殖为目的的性爱活动,但由此出现的“准母亲”形象凯瑟琳却非常平面而灰暗。凯瑟琳被温斯顿称为“毫无例外是他所遇到过的人中头脑最愚蠢、庸俗、空虚的人”^{[5]76}。这样的凯瑟琳对性爱充满抗拒,将为生育而进行的夫妻行房视为“任务”,最终也与母亲角色无缘。而书中的另一位母亲“派逊斯太太”则让人完全体会不到母亲角色的美好:她“是一个面容苍白憔悴

的女人,头发稀疏,满脸皱纹……好像她脸上的皱纹里嵌积着尘埃”^{[5]24-25}。这些党内的母亲们无一不是在精神上奄奄一息,失去身为女性的活力。温斯顿自己的母亲也早已在多年前就消失了。作者在小说中反复暗示温斯顿的母亲和妹妹是为了温斯顿而消失的:“她们所以在下面是因为他在上面……她们的脸上或心里都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知道,为了使他能够活下去,她们必须死去。”^{[5]35}在母亲和妹妹没有消失以前,温斯顿对她们的态度也是很值得商榷的:“她认为他是个‘男孩’,分得最多是当然之理。但是不论她分给他多少,他总是嫌不够……她如果不给他多盛一些,他就气得大喊大叫,把锅子和勺子从她手中夺过来,或者把他妹妹盆中的东西抢过来……他甚至觉得自己有权这么做。”^{[5]188-189}温斯顿的自私,他所认为的“自己有权这么做”,都在无形中体现了男性权力对女性的压制。可见,当温斯顿不再需要“母亲”这一形象时,温斯顿的母亲也就消失了。

天使、怪物或者母亲,都不能真正代表一个完整、丰满、立体的女性形象,都只是受到作家们任意操纵的人物形象。从各种意义上,“三部曲”中的女性都被剥离为苍白的剪影。女性以身份残缺之躯,往往在男性面前居于下风,成为沉默的被注视者、被规训者。在“三部曲”中,女性是符号化、物化的存在,其身份的残缺也注定了话语的无力:其文本中的对话与发言都是服务于情节、服务于男性反叛极权意识的展示,而没有表现自身(塑造个性形象)的能力,亦即缺乏为自己“发声”的权力。“三部曲”作为男性作家书写的、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女性不仅在作品中缺位,在作家的观念与思想中同样是附属于男性的存在,或者说作为爱情的所指而存在,其主体性同样缺位。

作为政治讽喻文本,“三部曲”包含无数道“凝视的目光”。在《我们》中,有无处不在的巡逻机和警察,人人生活在拉开帷幕的玻璃房内,透明的一切意味着来自资本主义极权政府无处不在的凝视。在《一九八四》中,温斯顿的生活受到电幕的监视,受到秘密警察的看管,全方位地暴露在“老大哥”的目光之下。他们时刻处于资本主义极权政权的监督与规训之下,这种规训权力既是

毫不掩饰的,又是绝对“审慎”的。说它“不掩饰”,是因为它无所不在,无时不警醒着,因为它没有留下任何晦暗不明之处,而且它无时不监视着负有监督任务的人员。说它“审慎”,则是因为它始终基本上是在沉默中发挥作用^{[7]200}。面对这样的目光,男性也在精神上处于一种彻底无权的女性的位置或“他者”身份,因此温斯顿才会对资本主义极权有着疯狂的反抗意识,在无处不在的、令他“他者化”的目光之下,他对裘莉亚说出“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越爱你”这样的话。这句话是温斯顿对自己男性身份的确认与彰显,他渴望通过对裘莉亚的性爱,通过对裘莉亚的“为所欲为”来恢复自己的男性气质,实现自己的男性身份。

而文本中的女性,她们受到的凝视是双重乃至多重的。一方面她们同样经历着来自资本主义极权政府的凝视,另一方面她们还是男性(包括作品内的男性形象,男性作者乃至男性读者)的凝视对象。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有女性都是被物化的存在,其表现完整地契合了福柯的规训理论:“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督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8]114}《美丽新世界》中的所有女性都生活在男性的凝视目光之下,对其外貌的品评是这一凝视目光的最常见形式,而女性也以收到的凝视目光的多寡来判定自己的受欢迎程度。因此,最美丽也最受到规训的莱妮娜对自己的认知从来都只局限于自己被凝视的外表:看到男伴心情不虞,她会认为是因为自己太丰满而引人讨厌。琳达起初也是因为畏惧来自他人的、对自己怀孕的肚子的凝视及其目光中包含的不屑意味而没有及时离开野人保留区。

女性经受的不仅是无处遁逃的凝视目光,还有这样的目光之下她们没有自我辩解的权力。在“三部曲”中,有两部作品采用了男性叙述视角,一部作品是全知视角的讲述,但无论如何,作品中女性出场、发言的场景都只占较小的一部分。不言而喻,女性在小说文本中的隐没,本身就意味着

女性“没有说话的权力”,这一权力被“移交”到了男性手中。在《一九八四》中,最鲜明的情节就是当温斯顿与裘莉亚为了加入反叛组织而在奥勃良的房间里密会时,奥勃良全程的关注点都是在温斯顿的身上,他“坐在椅上略为侧过身来,可以对着温斯顿。他几乎把裘莉亚撇开在一边,大概是视为当然地认为,温斯顿可以代表她说话”^{[5]200}。“她走后一关上门,他就似乎忘掉了她的存在了。”^{[5]206}最为可怖的就是“他可以代表她说话”的权力。在波伏瓦的《第二性》中,“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而是被造为女人的”这句话,其背后同样包含“男人可以代表女人说话”这层语义。作者既创造又囚禁了他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他一方面赋予其笔下的人物形象以生命,另一方面又剥夺了她们的主体性,迫使她们沉默^{[1]118}。当女性无法发声却又时刻被凝视时,就仿佛花瓶般被放置、被观看、被禁言,在“三部曲”中作为沉默、残存的爱情召唤而存在。

三、“她”性别的消失与男性“造物”的局限

反乌托邦文学无疑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它是对乌托邦概念、思想及其社会改造运动的一次深度反省,是针对乌托邦中“恶”的部分的批判,通过展示“恶”及其后果的方式来反对传统乌托邦的反人类性。在批判的过程中,让人心惊的不仅是资本主义极权带给人的窒息感,还有父权制下女性境遇的每况愈下。《我们》中的女性形象是镜像化、刻板化的;《美丽新世界》中的女性被剥夺了独特的生育权利,女性更像是一具物化的肉体;《一九八四》中的女性则是去性别化的、缄默的。女性在反乌托邦文学的描绘中被扼杀活力,面临的是“她”性别的行将消失。

“她”性别的消失,首先表现为对女性整体的切割。为了能够嵌入父权制下的生存框架,女性被抽象化为两类形象:一类是温柔、包容、慈爱、孕育的母性/天使形象,一类是邪恶、残暴、诱人犯罪的荡妇/妖女形象。天使形象是塑造出来的空洞假象,妖女形象则是对女性的极端丑化。实际上女性并不是简单二元对立的形象,如同灵与肉无法割裂,“纯洁”的爱与“放荡”的性同时存在于女

性体内,对女性进行强制性切割后的产物自然不能再称为“她”。如《我们》中的女性公民O-90与I-330,作家在刻画两个人物形象时采用了鲜明的对照手法,但小说中的O-90是在I-330的帮助下才成功逃到了绿墙外。尽管I-330反叛革命失败,而O-90肚子里的生命则孕育了革命的新希望与新未来。因此,只有I-330和O-90合为一体,只有将女性的两类特质结合、以复杂多元的眼光看待女性,才能看到真正的女性。

女性除了被切割之外,还有一类女性“消失”得更为彻底。这一类女性被彻底工具化,成为“子宫”“阴道”的符号代表。例如《一九八四》中的女性,被遏制性欲的同时被灌输生育的神圣性,女性子宫独特的生育功能,成为女性一切不幸遭遇的根源。另一类女性则是为满足男性性欲而存在,例如《美丽新世界》中的莱妮娜,她存在的唯一合理性,就是作为给男性带来快感的性工具。对女性的两种工具化使用,满足了男性延续后代的精神需要与发泄欲望的肉体需要,而在工具化的过程中女性已丧失了“人”的属性,更遑论作为“女性”而存在的丰富性与鲜活性。当然,小说中还有为数极少的女性,凭借自己的能力,摆脱了被切割、被工具化的处境,发挥出相对较大的价值,却站到了与男性相近的位置,成为“披上男性外衣”的假男人。既然如此,她也不再是女性的“她”了。遗憾的是,“三部曲”中存在的“她”性别的消失,以及由此带来的“爱”与“希望”的消失,至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毫无疑问,性别政治中存在的种种奴役、压迫、不平等甚至“她”性别消失等现象,男性、男权以及“菲勒斯中心主义”难辞其咎。历史上曾有一个母系制的社会时期,然而,随着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父系制很快取而代之,女性随后进入漫长的、至今不见曙光的“第二性”时期。在数千年的顺从和习惯中,广大女性也常常忘却自己的生命尊严和正当身份,恭顺谦卑地作为子宫、作为性的被使用者而生存。可以说,对女性的占有与控制最鲜明地体现在对性的管控上。福柯指出,“性不仅仅是被批判的对象,它还是被管理的对象,它属于公共的权力,它要求有各种管理的程序,它还必须由各种分析的话语来承担。”^{[9]16}在

此过程中,对“正当”的性的需求让女性成为被管控的“妻子”,对“邪恶”的性的需要则让女性背上骂名,被钉在“荡妇”“妖女”的耻辱柱上。资本通过不断的运作将性牢牢把控在手中,同时完成对女性的形塑,以更好满足父权制、满足资本发展的需要。于是,对待性的表面压抑与对待女性的“漫不经心”,成为最常见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男性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女性约等于生育、约等于性的社会。

在文学领域,男性作家就像造物主创造出世界那样“创造”了其小说中的父权思想,这是而且一直是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压倒一切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这一比喻正建构于作者(author)这一单词的意义之上,正是通过这一单词,作家、神圣和男性家长的身份获得了确认^[14]。对于“三部曲”中女性的具体描绘,受到了男性作家们个体经验的影响。《我们》的作者扎米亚金在刻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时倾注了自己的思想,并受到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影响。《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对女性的态度可以通过他1958年新写就的《重返美丽新世界》来一窥端倪。从其自叙中可以了解到小说中女性被剥夺生育功能的原因或目的:控制人口增长。“在我的寓言小说中,‘新世界’高效地解决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通过精确计算,世界人口维持在最合适的一个数量上,一代又一代,人口总数始终不变。”^[10]因此,在《美丽新世界》中,“母亲”这一称呼令人恶心,女性被剥夺生育功能,子宫成为摆设,少数可以生育的女性也受到严格的管控——一切为了人口均衡。但当被问及“为何不是‘父亲’的称呼被弃绝,‘阴茎’被划分为男性身上的无用器官”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时,作者对待女性的态度就呼之欲出了。往往是在下意识之中,女性就成为了数百年延续的父权制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物件。也有研究指出,“奥威尔的小说说明女性在大洋国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与她们在奥威尔生活的社会中的处境相似,而这一部分没有成为他谴责的内容。……但从没有注意到他本人也是这种男性极权的完美化身。”^[11]种种迹象表明,作家们的社会经历与当时西方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固化观念,造成了“女性”趋于消失的

恶果。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因此,“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12]⁸⁰,以使妇女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反观西方社会的发展,再结合无数文本中对女性处境的描写与解读,一个应该达成的共识是:解放、发展女性绝不是单纯指向与男权的对立和斗争,而是实现女性自身作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同样,男性自身的作为“人”的发展,也应是我們不可忽略的题中应有之意。

女性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的天然尺度。“三部曲”在一定程度上描绘的是西方社会随时可能成为现实的可怖未来,它们对女性生存地位的描绘应引发人们的警惕与思考。尽管女性“反抗”式的性别政治状态,已经被很多有识之士视为过时与不可取,但是人们仍然要随时做好这种心理预期,因为现实中的丑陋与惰性常常将本来无害的“末路狂花”逼迫成“致命女人”。面对性别差异,女性要时刻牢记自己作为平等的“人”的身份,既要警惕被全然物化的命运,不蔑视也不滥用性,实现女性自身的存在与价值;也要注意不被去性别化,不被彻底剥除女性特质而以男性的标准生存;更要注意,无需全然与男性对立而妄图“轮转”。简言之,女性既不应该是落居后位的“第二性”,也不会是超越男性的“第零性”;同样,“性别平等”也应该是男性铭记并实践的事实,平等的交往与合理的分工才能让社会更为健康地发展。实现男女主体性的平等,在此基础上尊重性别与个体的差异性,互相包容、互相补足,这才是女性与男性的真正平等。

参考文献:

- [1]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 阁楼上的疯女人(上)[M]. 杨莉馨,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2] 陈厚诚,王宁. 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 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 [3] 扎米亚金. 我们[M]. 赵丕慧,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 [4] 赫胥黎. 美丽新世界[M]. 陈超,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5] 奥威尔. 一九八四[M]. 董乐山, 傅惟慈,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6] Horan T. Revolutions from the Waist Downwards: Desire as Rebellion in Yevgeny Zamyatin's "We", George Orwell's "1984" and Aldous Huxley's "Brave New World" [J]. Extrapol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Brownsville), 2007 (2).
- [7]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2.
- [8] 李银河. 女性主义[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8.
- [9] 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M]. 余碧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10] 赫胥黎. 重返美丽新世界[M]. 庄蝶庵, 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
- [11] Patai D. Orwell's despair, Burdekin's hope: Gender and power in dystopia[J].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984 (2).
- [12]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On Female Images and Gender Dilemma in "Dystopian Trilogy"

FU Shouxiang¹, ZHENG Luna²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As political allegorical novels, "Dystopian Trilogy" contains countless "gazes", while the women are mirrored, materialized, symbolized and even degenerated. Their incomplete identities are doomed to the weak discourse, and lack of power to voice for themselves and ability to shape personal images. With careful reading of "Dystopian Trilogy" which walks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era, we can find that there exist the obvious blind angle of thoughts, the novels belong to the mal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uture" by taking the male as subject with the lack of female subject, the distorted female images encounter the dilemma of identity and self-expression, and there exist a series of crises such as the disappearance of "she" gender, extinction of love, hope and imagination in the embarrassment of women being scribbled. In the more rational era, the new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s with two genders living competitively and cooperating harmoniously need the integrity, self-discipline and effort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pursuing the tolerance and complementation.

Key words: dystopian trilogy; female image; female dilemma; gender equality

(责任编辑 合壹)